

读（德）李博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译本

朱 京伟

2003年8月，李博（德，Wolfgang Lippert）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以下简称“李著”）一书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不过笔者在书店里发现这本书是在一年之后。为此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相见恨晚，只怪自己信息不灵。回到家中仔细一看，才知道本书的德文原著早在1979年就已问世，虽然整本书讲的都是中国的事情，但中译本却要等上整整24年！知识的传播如此阻塞滞后，叫人横生感慨。

马克思主义的东渐曾经深深影响了日本的左派知识分子，传入中国之后更是引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专业术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些术语的产生过程和传播途径并不为世人所知。李博先生利用他汉学和日本学的双重功底，为近代东西语言交流及中日语言交流的研究贡献了一部力作。对研究中日语言交流史的人来说，李著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学刊《语文建设通讯》，还特意在2004年6月出版的第78期上刊登了姚德怀、黄河清两位先生所写的书评。笔者出于对日语借词研究的兴趣，一直在为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术语而收集资料，但说来惭愧，本人此前对李博先生的德文原著竟一无所知。最近刚刚通读了李著的中译本，借此机会谈一些自己的感想。

一 李著使用了哪些资料

李著使用了丰富的中文、日文和西文资料。笔者按照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目、辞典类、原始文献等3项分别做了粗略统计（或有重复出现的资料），结果如下：

	中文资料	日文资料	西文资料
参考书目	215	35	107
辞典类	20	23	8
原始文献	58	49	—

李著重点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何通过日文翻译最终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书中各类中文资料用得最多，而且资料的跨度几乎涵盖了从20世纪的前20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

时期。在李著引用的中文原始文献中，马列著作的中译本以及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撰写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清末的文人社会活动家梁启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的著述也是李著引用的重点对象。以梁启超为例，他有旅日经历而得风气之先，又勤于笔耕著述颇丰，因此，许多日语新词可能都是经过他首先使用后，才在汉语里逐渐传播开的。笔者从李著得到的启示之一是，如果对梁启超的著述进行更为系统地词汇调查（或许已经有研究者在这样做），有可能发现更多的使用日语借词的早期例证。

在使用日文资料方面，虽然数量不象中文资料那么多，但选取的都是关键性的重要文献，比如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们的著述和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主要翻译者的译著等。除此之外，李著主要使用了以下一些日文参考书：

山田孝雄（1940）『国語の中に於ける漢語の研究』実文館

実藤恵秀（1960）『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

豊田 実（1963）『日本英学史の研究』千城書房

実藤恵秀（1966）「中国語の中の日本語」『言語生活』10月—11月

森岡健二（1969）『近代語の成立・明治期語彙編』明治書院

永嶋大典（1970）『新版・蘭和・英和辞書発達史』講談社（1996 ゆまに書房復刻）

李著查阅了森冈健二（1969）和永岛大典（1970）著作中涉及到的几乎所有清末的“英华字典”和明治初期的“英和辞典”，一些古汉语的旧有词是否在明治初年产生了新义，主要是靠中日双方的这些辞典来判断的。其中引用最多的是：

柴田昌吉・子安峻『附音挿図英和字彙』日就社，1873（第一版）

柴田昌吉・子安峻『増補訂正英和字彙』日就社，1882（第二版）

島田豊『附音挿図和訳英字彙』大倉書店，1888

与对辞典类资料的倚重程度相比，李著对日本国语史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显得借鉴不足。比如，以下2书均为考察明治新词的力作，可惜未见李著提起。

広田栄太郎『近代訳語考』（東京堂，1969）

斎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講談社，1977）

此外，李著虽然使用了不少日文的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但在选用上有些缺乏条理，尚有一些颇具价值的文献没能涉及到。其实在李著问世之前，已经有日本学者对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历史文献进行过相当详细的整理，如：

渡部義通・塩田庄兵衛『日本社会主義文献解説』（大月書店，1958）

岩崎允胤『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哲学史序説』（未来社，1971）

等书即是代表之作，李著如能加以参考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当然，以上这些缺憾只是相对而言，李著的旁证博引已经充分显示了著者的广博知识和认真态度。李著留下的一些欠缺，正好

为今后的继续研究提供了课题和发展空间。

二 李著考察了哪些词

李著共考察了 44 组共 79 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术语。如果从中国造词还是日本造词的角度来区分这些术语，笔者认为可以分成以下 5 种情况。

(1) 可以直接查到古汉语同形词的二字词。这样的词有以下 37 个。(按李著顺序排列，下同)

社会	革命	资本	阶级	生产	劳动	农民	贫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人民	权力	政权	解放	反动
思想	理论	垄断	独占	统治	支配	压抑	矛盾
对立	价值	改造	意识	实践	专政	独裁	剥削
觉悟	自觉	群众	民众	大众			

(2) 参与构词的两个语素都有古汉语出典可查，但整个词是由日本人首先组合而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是三字词和四字词，共有以下 22 个。

社会主义	资本家	资本主义	封建制度	阶级斗争	生产力	生产关系
劳动力	劳动者	私有财产	唯心论	形而上学	辩证法	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	劳动价值	剩余价值	修正主义	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	知识分子
资产者						

(3) 参与构词的两个语素中有一方可以查到古汉语出典，整个词是由日本人首先组合而成的。例如“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中的前语素“共产”和“帝国”是日本人创造的，后语素“主义”有古汉语同形词存在。同样，“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的前语素“无产”和“中产”是日本人创造的，后语素“阶级”是从古汉语的同形词转义来的。可以归入此类的有以下 8 个三字词和四字词。

共产主义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帝国主义	上层建筑	无产阶级	无产者
中产阶级						

(4) 没有古汉语同形词，完全由日本人自行创造的新词语。以下 6 个词属于这种情况。

唯物论	压迫	压制	对抗	榨取	价格
-----	----	----	----	----	----

(5) 日语不曾使用，由中国人自行创造的术语。在最初形成时，这类词或曾受到相关的日本术语的影响，但毕竟不属于日本人造词。以下 6 个词属于这种情况。

生产资料	生产方式	生产率	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	------	-----	-------	------	-------

由此可知,在李著考察的术语中,纯粹的日语造词数量很少,大多数术语都是利用古汉语原有的词去对译西方概念而形成的。利用旧有词表达新概念时词义不免会发生变化,即产生新义。但是否做了译词就统统会产生新义?如果不是,又如何判断新义的产生呢?对此,研究者之间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就以上划分的 5 种情况而言,(4)类词是日语借词而(5)类词不是,这两类词比较容易确定归属。(2)类词的两个语素虽然都有古汉语词典,但组合之后形成的复合词具有全新且固定的含义,笔者认为应作为一个新词语看待。如果它们被引进到汉语中,理应属于日语借词之列。以此类推,(3)类词就更有理由被视为日语借词了。可见,真正需要认真区分是否产生了新义的,是在李著中数量约占一半的(1)类词。

三 关于产生新义的问题

在判断某词的新义首先产生于中国还是日本时,李著的主要依据是 19 世纪中后期出版的“英华字典”和“英和辞典”。如果在这两类辞典中,该词语作为表达某一现代概念的英语原词的译词出现,便可以判断它已具有新的词义。这个方法是基本可取的,但李著的研究结果却显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有时还需要进一步弄清“首先产生新义”的一方和“首先使用新义”的一方是否两相吻合。例如:李著在探讨“资本”一词的新义时指出,在 W. Lobscheid (1871) 和 W. Williams (1874) 的汉英词典以及邝其照的《英汉词典》(1882)中,“资本”已经成为 capital in trade 的译词,而“这三本词典问世时,日语尚未在词汇上对汉语产生影响。这样看来‘资本’一词(的新义)必定起源于中国”。(p152)但接下来著者又说:

尽管这个词很早就出现在汉语词典中,但中国的经济类文章直到 20 世纪初也未曾使用过这个词。所以,明治早期的日本人将该词作为“资本”的专门术语引入科学专业用语是功不可没的。

按照著者所举出的例证,严复和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仍将 capital 译为“母本”或“母财”,这表明中国人起初确实没有使用“资本”一词。其后,著者又以《新尔雅》(1903)的释义为例进而指出:“‘资本’一词在 20 世纪初似乎被中国人当成一个从日语中借用的新借词,尽管‘资本’这一形式早就出现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p154)

综上所述,著者一方面说明新义首先出现在中方的英华辞典中,另一方面又指出是日本人首先把新义用作专门术语的。像“资本”这样的情况是否作为日语借词看待?类似的情况绝不限于“资本”一词,因此这是一个值得讨论并需要取得某种共识的问题。历史进入 20 世纪时,中国在近代科学领域全面地落后于日本,有一大批出自古汉语的旧有词,都是日本人在对译西方概念的过程中,首先把它们作为专业术语运用到科学领域中来的。是否日本人在明治时期首先使用,而后又在清末民初开始流行于汉语的那些古汉语的旧有词都应视为日语借词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在中国学术界争论过,但当时受到政治气候和研

究成果两方面的制约，讨论难以充分展开。（参见沈国威 1994 第 2 章的归纳）当时，汉语学家王力先生也曾发表过看法，他在定义“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语，而给以新的涵义”一类日语借词时说：“如果汉人先译，可能也是这样译的，但实际上是日本人先译，中国人也就照抄了”。

（《汉语史稿》1958，下册 p529）王力先生认为这样的词也是日语借词，他作为示例举出的有：革命、教育、文学、文化、文明、经济、封建、机械、机会、唯一、演说、同志、精神、具体、专制、社会、劳动、表象、环境、保险、意味等 21 个词。但笔者对此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试想：如果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能不约而同地想到用同一个古汉语词去对译某个英语概念的话，是否可以说这个古汉语词的含义与对译的英语词大致相等？这样的对译过程并不一定要有新义产生。

纵观李著对各个词语的论述，将其中一些词（如：社会、革命、阶级、资本、经济等）的词义变化描述得十分到位，在旁证博引的基础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另有一些词（如：贫农、中农、富农、权力、政权等）由于没能够查到古汉语出典而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造词。这些或许还无碍大节，可以见仁见智。最令笔者困惑的是，书中许多地方的叙述前后矛盾，在缺乏论证的情况下，把一些看不出有明显词义变化的古汉语词也当成了日语借词。

例如：李著在论述“财产”一词时说：“日本人在造这个词时无疑受了古汉语中由‘财’和‘产’两个词构成的‘财产’这个组合的影响”。（p202）又如，在论述“农民”一词时先说“汉语术语‘农民’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而下文中又说“Nōnin 这一形式显然由古汉语词组‘农民’发展而来，后者作为词汇单位出现在东周末年和汉朝的文献中”。（p205）再如，在论述“权力”一词时说“‘权力’一词是明治早期的日语新造词”，紧接着下文中又出现“日本人在造 kenryoku 一词时显然依据了《汉书》中出现的古汉语并列结构‘权力’”。（p222）……诸如此类的叙述在李著中屡屡出现，叫人无所适从。就常识而言，如果是日本人创造的词，就不应该有古汉语出典。论述时，何者是旧词的出典何者是新义的依据应该彼此分清。如果是指旧词产生了新义，则应该明确地指出词义变化的过程。

笔者不识德文，或许上述这些矛盾的行文并非出自著者本身，而是由于中文译者的措辞失当造成的。但有必要指出，这样的描述很容易给不熟悉词汇交流史的读者造成杂乱无章的印象，是李著中译本应当避免的最明显的硬伤。尽管如此，笔者对李著的译者也无意一味地责怪。因为学术著作的翻译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但要精通双方的语言，还要深入了解所翻译的研究领域乃至著者的学术观点，这些苛刻的条件实在叫人望而却步。

四 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时期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日语借词进入汉语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进入 20 世纪后的头 10 年是大量输入的高峰期，五四运动以后直接借用日语词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对日语原词加以修正以及中国人自己的造词逐渐增多。从李著的研究结果看，马克思主义术语方面的日语借词

也基本符合上述规律。李著以 1903 年为界线，把论述的对象分为 1903 年以前在日语中出现的术语和 1903 年以后在日语中出现的术语两部分。这种划分基于著者以下的认识 (p104)：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知识界的开始时间应为 1903 年。是年，在上海出版了三部篇幅比较大的日语社会主义著作的中译本。

虽然日本在 1903 年以前也未出版过日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但对 20 世纪初出版的日语社会主义题材的文章和书籍所作的研究表明，日本左派人士早在 1903 年就已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且，大量表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现代词汇在当时的日语中已经存在。

1903 年出现日语社会主义著作的中译本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吻合的。以笔者调查过的哲学、植物学、音乐等 3 个学科为例，它们最早的日籍中译本分别出版于 1902 年、1903 年和 1904 年。《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 卷首的“说略”专门提到：“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癸卯甲辰”正是指的 1903—1904 年。这些都说明，1903 年在近现代中日词汇交流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在马克思主义术语进入汉语的具体时间上，李著对所考察的大部分词语明确给出了汉语文献的首出例，它们相对集中在以下几种文献中：

《时务报》(康有为、梁启超主笔，1896—1898)

《清议报》(梁启超主编，1898—1901)

《新尔雅》(1903)

《东方杂志》(1904—1948)

《饮冰室文集》(梁启超著)

李著认定的首出例需要今后进一步加以验证，而黄河清先生的书评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黄河清先生多年来一直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查找和积累汉语新词语的书证，他在书评中对李著的 15 个词语的首出文献提出了修正意见。在此整理对照如下：(部分题名有省略)

	李著首出例	黄河清修正例	提前年数
共产主义	《新尔雅》1903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	1 年
资本家	梁启超《论强权》1899	傅兰雅《格致汇编》1890	9 年
生产力	民鸣译《共产党宣言》1908	《清议报》二十二册 1899	9 年
中农	毛泽东《湖南农民…》1927	李大钊《土地与农民》1925	2 年
富农	毛泽东《怎样分析…》1933	李大钊《土地与农民》1925	8 年
地主	《民报》具体时间不详	《民报》第一号《进步与贫乏》1905	

思想	严复译《群己权界论》1899	《时务报》1897	2年
理论	《新尔雅》1903	沈敦和《德意志国志略》1894	9年
唯物主义	未提及具体时间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一》1902	
意识	《新尔雅》1903	章炳麟《社会学序》1902	1年
知识分子	大约20世纪20年代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	
实践	《东方杂志》1912	方经《估洋教授浅说》1905	7年
资产阶级	陈独秀《谈政治》1920	沈兼士《新青年》杂志1919	1年
小资产阶级	大约1920年左右	李大钊《追悼列宁一》1924	
买办阶级	《马克思主义浅说》1925	蔡和森《对于广州印刷一》1924	1年

通过黄河清先生的努力，李著中部分词语的首出例提前了1年至数年。这些修正例十分宝贵，因为哪怕只提前1年时间，毕竟也与我们苦苦寻求的首出例又接近了一步。黄先生的工作既说明李著中的例证还有向前推进的可能，同时也验证了李著的可靠程度，使我们相信李著所持的大部分例证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笔者还要借鉴李著的另一个长处：一般来说，某个术语的最初出现和该词语的普遍使用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李著在努力寻找首出例的同时，还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术语进入汉语后的变化情况。不单概念史研究应该这样，词汇史研究也应当具有这样的跨度。

总之，李博先生在20多年前就拿出了如此资料详实体系完备的论著，笔者除了对著者具有的前瞻性学术眼光十分敬佩之外，也由此得以窥见德国的汉学及日本学研究的雄厚实力，这些都是阅读李著的收获。